

譯叢《舊題材新聲音》序

盧瑋鑾

筆名小思。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。主要著作《承教小記》、《小思散文》、《彤雲箋》等。

評
論

剛從編輯二十到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學作品工作中，喘一口氣走過來，定一定神再細讀《譯叢》所選譯的六篇香港青年作家作品，不禁興起了「隔世」之感，時空跳接得我眼花繚亂。

在舊與新一出一入之間，我實在沒法子擺脫歷史溯源、新舊比較的窠臼。多方考慮之後，決定聚焦在這一點上，相信容易以一個較大的場景展示香港文學的今天面貌。

許多香港文學研究者都難免避開下面一個話題：香港文學，特別是小說創作，是循甚麼途徑發展的？

這不妨從二十年代說起。不過要說香港文學主流，卻也真不知如何說起。私塾讀經、太史公式詩文唱酬、報刊雜俎中鴛鴦、武俠、塘西風月，畢竟最為「識字」的人所熟悉，但這些也難稱之為甚麼文學主流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中國大地上正有一股新文學之風與傳統文學爭一日長短。香港一小撮愛好文學的青年人——唸洋書或者不滿太史公式文字的青年一代，他們翹首遙望，發現了大地上，正有一股新風流動。一個都會風景近似的大城市，最易令存活於英殖民小島的他們神往。上海，這個大都會，在血緣、形格上，大致最易成為他們汲取文學養份的地方。同時無論甚麼文學形態，現代主義、寫實主義等等，對他們來說，都本來是一無所有，當創作意欲矍矍萌發，必須尋求某種手段，把種種意念表達出來的時候，看到母體大地上有一個形格相近的兄弟，早已在文學路程上，遙遙領先，無論現代或寫實，都足以叫本無所有的小子感到可驚可喜。他們從買到的新文學書刊中，吸納了不同文學形式，再在自身的生活空間提取可用之材，開始學步。大都市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：矍矍的戀情、無端的怨念、自我的悲情、都市生活細節……十分自然地進入了那群香港少年作者的筆下。謝晨光的短篇小說《最後的一幕》；與女友S從皇后戲院看完由Ibanez的小說改編的Torrent出來，到Pedder Street

的Cafe de pansian喝咖啡，發展下來的戀情與電影劇情融成已殘玫瑰，全文瀰漫著現代主義的試驗意欲，徘徊在擺脫封建束縛與自困情慾之間。(1927年這小說發表在上海《幻洲》)窮巷小街樓上小房間的城市飄泊者，雖不致搬演全套無產階級的寫實理論，但也足以構成掙扎求存的小市民色彩。華胥寫《飄泊者的故事》，就細節描繪了窮人欠交租金的徬徨，日後侶倫《窮巷》的情節與寫作手法，已在此見到端倪。(1932年這小說發表在《香港工商日報》)

這時期的香港青年作者的作品，可以說很容易讀懂。他們學步的成績，在當時的香港文壇，是那麼新——全新的題材、沒有作家觸及過的社會問題、表達的手法，都非一般讀者所慣看的。又是那麼舊——在今天的讀者眼中，過份的模擬、幼稚的敘述，可以說沒有作家自己的風格，又果然那麼舊。但深切想來，仍使人感受到他們對文學創作的癡念，和從無到有的爭取過程的艱辛。同時也可想像當年他們翹首遙盼母體溫安的悲哀。

這一次《叢譯》編者選擇了九十年代年輕一代的香港作者的作品——他們的作品從來沒有譯成外文，我相信選譯者的選擇，必有一定的要求標準。「舊題材新聲音」，正好突顯了他們採用的書寫手法的新。這種「新」，毫無疑問表現了九十年代年輕一代的香港作者，如何從「舊」形式中擺脫出來——從前輩追跡中國文學、模擬創作形式的羈絆脫身出來。脫身以後，要朝那一方向進發？他們多企圖從西方的文學理論或創作形式，汲取另一種養份，自覺地嘗試以香港人視野觀照歷史身份，並把獨特的香港生活、香港人在政治夾縫受到磨難後的反省、個人性別情感的困惑，融入西方的多樣文學程式中。至於「舊題材」，文學本來就無法擺脫許多人類的永恆主題。二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學，講都市生活，講人際關係，講兩性追逐，一切喧嘩與寂寞，到了九十年代，香港年青一輩何嘗能離棄得了？但在「舊題材」中，

其實他們卻有了與上輩不同的遭遇，直接影響了取景角度，這使舊題材有了新景觀。

香港的故事如何敘述？在經濟轉型、在層層的政制變動中，在不斷承受西方理念衝擊下，香港作者多了許多前人沒有的考慮，例如：平民生活的異態發展中的鄰里情誼、家庭長幼結構、夾在中國歷史裏的香港身份、傳統社會秩序崩潰後的兩性關係。這些題材，在青年作者筆下，自有一番新貌。

早期的香港文學作品，不易讀到《父親》中的鄰里關係。伍淑賢淡筆寫出六十年代香港屋邨的小市民生態，兩家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，不同的謀生技倆。為使家人有飯可吃，作父親的廖先生那種種付出，正好展示了六十年代香港人在經濟轉型中，無怨無悔的血汗辛勞。陳惠英的《命定相隨的聯繫》，在現實生活細節拼貼中，閃現的漆匠和頭一個妻子的關係，由於女人「死命要出香港」而破裂。作者用一種超然或冷卻的態度，來處理因為中港兩地某些矛盾形成的兩性關係。

所謂「他族」與「她族」之戰，早已成為作家筆下不可或缺的素材。於女性身份改變與女性解放的世界氛圍影響下，香港女作家書寫兩性之爭時，卻增添了努力自我解脫，而實則痛苦依舊的悲哀。《一次談話的補充說明》的陳寶珍，細意講述了嫦娥與羿相戀又相分的故事後，強調離婚女性如嫦娥在月亮上安全著陸，從此不再寂寞。但一旦面臨親密關係解體，在非常公式、毫無隱秘的場合中，經過十分符合法律程序的判定後，「她」已成了人間的嫦娥，徘徊在另一場與「他族」的戰爭中。儘管「在痛苦與倒懸的寂寞中漸漸學會自給自足，獨自發放特異的神采，不再依賴，不再衰老。」但終歸只是乾花一束。「乾花」真是一個極其新的無奈與諷刺，也隱約聽見嫦娥青天碧海的嗟歎。關麗珊用一種疏離角度敘述兩個現代女性對自身與異性相處的困惑，《天使與天使的光環》中的三角關係，兩個看似獨立自主的女性，一個陷於記憶系統混亂失常，一個用盡現代化工具：電腦、平面方角電視機、新的音響器材，……都是為了爭取並不守護她們的守護天使，「他族」在一場激烈戰爭裏，竟然表現得沒甚麼切膚之感，只怡然活「在一個自給自足的世界裏面，」這不禁使人想到黃碧雲在《豐盛與悲哀》中，遙遙向魯迅《傷逝》致意的幼生吃雞片段。宋可怡說送一塊「仁心仁術」的大鏡給胡國威，真是很入骨的反諷。

說到如何以香港身份觀照中國歷史血脈？這是早期香港文學沒有碰過的題材。不是因為敏感，而是剛剛相

反，是不知從何生感。到了九十年代，青年一代忽然遇上中國——似熟悉又陌生，中港關係絲連，令一向並不關注自我身份的香港人，得從頭細認一頁頁曲折離奇的歷史，錯愕在極度複雜的謎團中。

《豐盛與悲哀》中，趙眉和幼生的故事，自然免不了是個「她族」與「他族」的戰場敘述，但由「本事」到「演出」，正是中國歷史山窮水盡的搬演，黃碧雲「如何抵受歷史與愛情的誘惑」？在書寫中，電影拍攝是重要的環節。這正好是我們思考的課題，作為香港人的作者，在陳述中國歷史時，只能轉嫁於似實還虛的手法上。編劇、導演、男女演員、美術指導、燈光師、場記，一群香港人努力在上海拍電影，但「電影沒有如他想像中般完成。電影以外又發生著可笑可悲的事，似曾相識，但不在演繹處出人意料。」結局只能嘆句「戲差極了」，誰叫你要說一個中國的故事？不過，對香港人來說，說一個上海的故事，產生的幻覺還是很吸引的。

董啟章的《少年神農》，搬弄的是遠古的中國神話故事。浪漫的「他」「她」故事，一切悲劇不來自兩性的戰爭，而是為了倉頡透露了天地的機微，疊遂老去，破壞了他們的好事。但令我感興趣的，卻是生活在九十年代香港的神農故事。中國神農以身試毒，一日遇七十毒而不死。少年神農揹著老去的疊走進回憶，並在疊死後，作永恆的等待。到了香港神農，卻完全不是那一回事。這個「神地」的神農，卻非常畏毒：他畏泳池的氯氣、海水含的大腸桿菌、臭氣層穿洞的紫外光……他對愛情也沒有任何盼望。女友卻以最毒的謊言——自己是個愛滋病毒帶菌者，騙了他。到小說結尾時，竟是他吃了由中國大陸運來的毒菜而昏迷危殆，由女友揹著他跑到墟上電召救護車。吃大陸毒菜而令香港少年神農危殆，是不是一個隱喻？男女對調了背負對方的角色，又是否可讀成兩性關係的從新思考？

我並沒有十分確切的結論，去論述這六位青年香港作者的作品，是否有足夠的香港文學代表性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們立足香港，接受西方文學創作模式，採納香港生活與思維養份，說出九十年代的新聲音。

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

(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出版《HONG KONG STORIES-OLD THEMES NEW VOICES》之序，中文版首次發表)